

那一年的风雪,那一年的饺子

□肖复兴

40年前,1971年,我在北大荒。那时候,还叫生产建设兵团。我被临时调到六师师部宣传队创作节目。春节前,宣传队放假,队里的知青都早早回各自的团或连里去过年了。我因一点事情耽误了,想在年三十晚上吃年夜饭前赶回我所在的大兴岛的二连。我在那里已经三年了,乘同一列火车来的同学都在那里,那里的老乡也都熟,便把那里当成自己的家。好在那里离师部只有40里,不远,过七星河就是,乘公交车一个多小时就到,便胸有成竹。

谁想到年三十天没亮就把我冻醒了,开始以为偌大的宿舍因为就我一人,屋子太旷,要不就是炉子灭了的缘故,起来一看,炉子里的火烧得挺好,往窗外一瞧,才知道大雪封门,刮起了大烟泡,漫天皆白,难怪再旺的炉火也抵挡不住寒气逼人。心想糟了,这么冷的天,这么大的雪,去大兴岛的车还能开吗?但是,还是抱着一线希望去了汽车站。那里的人说:“还惦着开车呢?看看,水箱都冻成冰坨了!”

我的心一下子也冻成了

冰坨。天远地遥,天寒地冻,这个年只好我一人孤零零过了。说心里话,来北大荒三年了,虽然艰苦,但每一个年都是和同学、老乡一起过的,便也都是乐呵呵的,暂时忘掉了思家之苦。现在,我要独自过年了。漫天飞雪,天又是如此寒冷,而且师部的食堂都关了张,大师傅们都早早回家过年了,连商店和小卖部都已经关门,别说年夜饭没有了,就是想买个罐头都不行,只好饿肚子了。

大烟泡从年三十刮到了年初一,也没见有稍微停一下的意思,老天爷在玩自以为挺好玩的游戏。我一宿没有睡好觉,大年初一,早早就醒了,望着窗外依然寒风呼啸、大雪纷飞,百无聊赖,肚子又空,想家的感觉袭上心头,异常感伤起来。我一直假在被窝里,迟迟不肯起来,睁着眼,或闭着眼胡思乱想。

大约上午九点多钟的时候,忽然听到咚咚的敲门声,然后是大声呼叫我的名字的声音。由于大烟泡刮得很凶,那声音被撕成了碎片,显得有些断断续续,像是在梦中,不

那么真实。但那确实是敲门声和叫我名字的声音。我非常奇怪,会是谁呢?在师部,我仅仅认识的宣传队里的人一个个都早走了,回去过年了,其他的,我没有一个认识的人呀!谁会在大年初一的上午来给我拜年呢?

满怀狐疑,我披上棉大衣,下了热乎乎的暖炕,跑到门口,掀开厚厚的棉门帘,打开了门。吓了我一跳,站在大门口的人,浑身是厚厚的雪,简直是个雪人。我根本没有认出他来。等他走进屋来,摘下大狗皮帽子,抖搂下一身的雪,我才看清是我们二连的木匠老赵。天呀,他是怎么来的?这么冷的天,这么大的雪,莫非他是从天而降不成?

我肯定是睁大了一双惊奇的眼睛,瞪得他笑了,对我说:“赶紧给我倒碗开水喝,冻得我骨头缝里都是风了!”我赶紧从暖水瓶里给他倒了一碗开水,这是我这里唯一可以吃喝的东西了。他先用双手捂着搪瓷缸子,把手稍稍捂热,开水也就渐渐变温了,他几乎是扬着脖子一饮而尽。我赶紧

去拿洗脸盆,想给他倒热水水洗把脸,暖和一下。他拦住了我:“这时候可不敢拿热水洗脸!你先别忙!”说着,他蹲下来,捡起点儿地上刚刚被抖落的残雪,使劲擦手擦脸,直到把手和脸擦红擦热,他说:“行啦,没事了。你拿去个盆来!”我这才发现,他带来了一个大饭盒,打开一看,是饺子,个个冻成了硬邦邦的坨坨。他笑着说道:“可惜过七星河的时候,雪滑,跌了一跤,饭盒撒了,捡了半天,饺子还是少了好多。凑合吃吧!”

我立刻愣在那儿,半天没说出话来。他是见我年三十没有回队,专门来给我送饺子的。如果是平时,这也许算不上什么,可这是什么天气呀!他得多早就要起身,没有车,40里的路,他得一步步地跋涉在没膝深的雪窝里,他得一步步走过冰滑雪滑的七星河呀。

真的,我过过那么多个春节,吃过那么多次饺子,没有过过那样的一个春节,没有吃过那样的一次饺子。当然,也再没有遇到过那样冷那样大的风雪。

跟上海“老乡”一起过春节

□戴永夏

1968年秋天,正是“文革瘟疫”大肆虐时期,我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后,被分配到四川省梁平县(现属重庆)工作。同时分去的,还有七八位上海的大学生,他们分别毕业于华东师大、上海师院、上海水产学院、上海医学院等院校。尽管我们素不相识,但共同的遭遇,共同的命运、共同的志趣把大家紧紧地连在一起,自发地形成一个团结友爱的小团体。

梁平地处川东山区,自然条件差,群众生活苦。尤其正值“文革”,到处“造反有理”口号震天,派仗武斗硝烟弥漫。而“知识”和“知识分子”在当时被贬得一钱不值,成了“罪恶”和“反动”的代名词。我们这些戴着“臭老九”帽子的大学生,就要在这陌生的地方和险恶的政治环境中“接受再教育”,其生活的艰难和精神上的压力可想而知。也正是这些外在的压力,促使我们团结一心,思想上相互关心,生活上相互帮助,行动上相互协调。我们这八九位同志,只有三名

留在县城,其余都分到下面的区乡公社。但我们却像一个分散的大家庭中的成员,住在乡下的进城,就吃住在城里的“家”中;而我们“城里的”下乡办事,也必定去看望在那里工作的“兄弟姊妹”……就这样,我们相互关照,相濡以沫,共度着那段艰苦岁月。

不知不觉,1969年春节来到了。“独在异乡为异客,每逢佳节倍思亲。”节前,我们特别思念故乡的亲人,然而上头有规定,头一年分配的大学生是不能回乡探亲的。就在我正为此事深感苦恼时,从上海水产学院分到县城食品厂的丁子谷同学给我打来电话,说春节我们这些上海老乡(他们把我这山东人也当成“老乡”了)都到他那里去,我们在一起过年。听到这一消息,我真是喜出望外。因为在彼时彼地,我最亲的“亲人”就是这些上海“老乡”。

老丁所在的食品厂是家只能做酱腌咸菜的手工作坊,条件极为简陋。他的单身宿舍在一座木头小楼上,更是破败不堪。不过春节这天,小楼里

却充满了欢乐的节日气氛。这天一早,分到乡下的同学就陆续坐车赶来了,他们有的带来了腊肉,有的带来了烧鸡,也有的带来了山货土产……尽管当时副食供应紧张,但老丁还是想法搞到一点猪肉。不过这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,因为别人知道了,会说我们“脱离贫下中农”,不虚心“接受再教育”,在单位要受指责、吃白眼的。由于我所在的县广播站不放假,我只能在中午广播结束后,从伙房里买上几个馒头,做贼似的偷偷地溜进食品厂。

那天的气氛十分热闹。来者都各尽所能,为节日增添着丰美和快乐。特别是方慧茹、蒋丽倩这两位来自上海师院和华东师大的女同学,充分发挥其烹饪特长,主动担起了掌厨的重任,精心制作了红烧肉、红烧狮子头等多道上海风味佳肴。有的同学还遵照“有菜无酒不成席”的祖训,特地弄来一瓶当地产的“万县大曲”酒……就这样,在这个暂时属于我们的小天地里,我们忘却了忧愁,忘却了烦恼,尽

兴地喝着美酒、吃着美味,无拘无束地畅谈着、倾诉着、歌唱着……把胸中的郁闷、不满、压抑一并倾吐出来,充分享受着自己创造的幸福和温暖……这是我们来四川后过得最痛快的一天,也是过得很愉快的一个春节。事后,尽管因为这“无组织、无纪律的行动”,我还受到单位领导的批评,但我一点也不后悔,因为在最艰难的时候,它给我带来一段最美好的时光……

时光飞逝,40多年过去了。尽管我早已离开四川,这些年来在不同的地方,以不同的方式过了许多春节,这些春节有吃不完的美味佳肴、看不完的娱乐节目,忙不完的人情应酬……但我总觉得,它们都不及我在四川过的那个春节美好和有味。或许这正应了某哲人说的那句话:哪里有亲情,哪里就有欢乐。当年虽然条件艰苦,但那个春节却充满患难之交中的浓浓亲情,因而也有着不同一般的幸福和欢乐。这样的春节,怎能不是最美好的春节?

过年他送我一篮子盐

□刘希

最深刻的过年记忆是前年在越南过年。当时我和先生在越南工作,春节前,公司放了假,我正收拾着行李,婆婆打电话过来说:“你姐接我们去她那里过年,你们今年就留在越南过春节好了。”先生一听,高兴得一蹦三尺高,恨不得抱着电话狂吻几下。他一向喜欢越南的天气,在胡志明市,很少遇到阴云密布的日子,多半都是阳光灿烂,天天适合游泳。

先生放下电话,凑在我耳边,笑嘻嘻地说:“今年,咱们也开开洋荤,在国外过个年!”他还神秘秘地说,保证让我过一个不一样的春节。正月初一也是我的生日,因此我满心期

待。我也喜欢越南,连冬天都是温暖宜人的,大片的棕榈和橡胶林,花坛里尽是不知名的花木,满眼望去,绿油油的,叫人怎不生出一番喜悦的情怀来?

年的气息越来越浓了。刚过腊月二十,花市就开始热闹起来,越南人最爱的年花有剑兰、大丽菊、金橘和桃花,每到过年,每家每户都要在家里摆上几盆。

一位越南朋友请我们去他家吃年夜饭。越南人的过年习俗与我们没什么两样,同样也是尊崇“有钱没钱,回家过年”的理念,除夕这天,再远的人也要回家与家人团聚。餐桌上,猪肉绿豆馅的方形粽子和炸春卷

是不可或缺的年菜,鸡肉也必不可少,做法有很多种,椰奶鸡、炸鸡、咖喱鸡丁,每一种都味道独特而有滋有味。

正月初一大早,先生就笑呵呵地对我说:“老婆,生日快乐!今天你想要什么就买什么,随你挑。”我高兴极了,早就看中一款价格不菲的项链,这时叫他送我不正合适?我拉着他就往商场跑。到了那里却吃了个闭门羹,再转到其他地方,也都是大门紧闭,根本不营业,偶有几个开着门的,一问,其他不卖,就只卖盐。我不信邪,到处转了转,结果还是只卖盐。看来在越南,我的生日就只有买包盐回家了,难怪

有人说越南人在正月是“好吃好喝”的享受时光,有生意都放着不做的,我不由得羡慕起他们的随性生活来。

结果,先生买了一篮子盐作为我的春节兼生日礼物,说主妇居家,盐是好伙伴,这个礼物肯定让我一生都难以忘怀,我无可奈何地“笑纳”了。晚上,先生破天荒地做了一顿丰盛的西餐,点上红蜡烛,开了红酒,还象征性地放了“鞭炮”(其实是一段录音),我们小口小口地吃着自做的比萨,抿着红酒,就着浪漫的烛光,哼着儿时的歌曲,快快乐乐地度过了这个只有盐做礼物的春节。

过年

那一年

如今的孩子,对于过年的幸福记忆,即使再深刻,恐怕也难以跟困难时期的一碗冻饺子、艰苦岁月的一次短暂欢聚相提并论了。或许,苦难中得来不易的些微享受,不论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,总是令人格外难以忘怀。

如今,当物质不再匮乏、娱乐精神肆意泛滥,当我们静下心来倾听他们的“那一年”,是否也能忆起自己的“那一年”?

■编辑:孔 昕
■美编:马晓迪